

张建华：《激荡百年的俄罗斯：20世纪俄国史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pp.134-156.

第六章 模式：斯大林时代与斯大林模式

一部苏联史乃至20世纪世界历史都与一个人的名字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他以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给历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的名字是斯大林，而他的真实姓名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斯大林^①则是他从事革命活动，成为职业政治家之后，为自己取得的姓氏。的确，斯大林的性格，他的为政风格，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创造的斯大林模式都不负于这个特殊姓氏，象钢铁一样棱角分明。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失去独立而不断挨打。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②这是斯大林在1931年2月4日全苏社会主义工业人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苏联人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卫国战争前完成了全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动员，并且取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他的那个时代，他变成了无所能的“神”。人们毫不吝惜地把一切富有表现力的歌颂之词送给他，他是“列宁的战友和事业的继承者”、“人民的伟大导师”“工人和农民最亲密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敬爱的慈父”。

然而，仅仅几年以后，斯大林在其身后又变成了人人咒骂的“恶魔”。人们齐声讨伐和诅咒他，任何被掘墓扬灰，灵魂不得安宁。他变成了“残暴的独裁者”、“嗜杀成性的暴君”、“精神病患者”。

曾经担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他的著作《斯大林》中试图给出“正面”和“侧面”的斯大林形象。他写到：“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在我国历史上，没有比斯大林更矛盾的人物了。他一个所受到的赞扬和指责都足够整整一个罗马军团的历史人物来承担。……关于他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将会长期争论下去，伴随着各种各样渲染过的修饰语：既有信仰，也有仇恨；既有痛苦，也有永恒的困惑。不管怎样，斯大林的命运再一次使我们确信：归根到底，伟大的思想的权力比人们的权力更强大”。

的确，斯大林执掌苏共和国家大权将近29年，几乎占整个苏联历史的一半时间。斯大林开创了一个时代，因为他给这段苏联历史留下了太深太厚的印迹。这条印迹忠实地纪录了斯大林的业绩和成就、失误和过错，这条印迹被称为斯大林模式。他执政的29年，完全可以称为“斯大林时代”。

在本讲里，我们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巨大成就与问题。第二个问题：异常激烈的党内政治斗争。第三个问题：肃反，还是政治大清洗？第四个问题：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第五个问题：斯大林个人专权与个人崇拜。第六个问题：本讲小结。

一、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巨大成就与问题

^① 斯大林“Сталин”的词根为Сталь“钢”。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40页

列宁多次表示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如何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他在去世前的数篇著作中集中论述了通过分散的、政府与农民有着某种“特殊契约关系”的、看似资本主义方式的合作制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但是遗憾的是，一方面是由国际环境和日益临近的战争威胁的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党内愈来愈激烈的政治路线斗争的因素，再一方面是斯大林本人的认识水平和个人决策的因素，列宁所主张的新经济政策式的“合作制”方针被放弃，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方针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贯彻。

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了第15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提出：“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①

这次大会最后通过决议，提出：“在目前时期，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成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因此这次大会是以“集体化的代表大会”载入苏联党史的。

斯大林宣布：“从1929年夏季起，我们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开始了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方面的转变。”^②1929年12月，斯大林再次强调：“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势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③从而使富农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富农意味着被剥夺，意味着敌对的阶级关系。

1929年11月，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文中强调：“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生大转变的一年。这个转变是现在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的。”对于在集体化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斯大林表示满意。他认为应该以行政手段加速这一过程，即“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新现象是什么呢？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④以《大转变的一年》发表为标志，在全国上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很快全盘集体化又演变成政治运动。

在全盘集体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引起了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注意。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在肯定全盘集体化的胜利成果的前提下，批评了集体化运动违反农民自愿的原则，“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暂时丧失了清醒的理智和冷静的眼光。”^⑤

1930年春夏季，在联共（布）中央的批示下，各地的集体化的步伐有所放缓，一些过火的作法得到了纠正。但是从这一年的秋季，集体化运动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年底前就有100万农户加入集体农庄。1931年8月2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加快集体化速度和巩固集体农庄的任务》的决议，将68-70%的农民，75-80%的土地加入集体农庄列为农业集体化完成的标准。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32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总数的62.4%，加入集体农庄的土地已达到80%以上。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的1937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总数的93%，划归集体农庄的土地已占99%。集体农庄的固定生产资料总值到1934年增加到66.2亿卢布。

农业集体化成就是巨大的。1937年苏联的黑麦、小麦、燕麦的亚麻纤维的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皮棉的产量上升到世界第三位。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和建立起新型的国营农场，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农业的传统经营方式和组织结构，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俄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其工业发展水平在欧洲长期处于落后状态。1861年农奴制废除之后，方开始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但是，尽管在19世纪80-90年代末出现了工业经济突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6-157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9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8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3页。

飞猛进发展的“工厂滥设”的浪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现了垄断经济迅速发展其集中程度甚至超过有“托拉斯帝国”之称的美国的现象，但直至十月革命前，俄国仍然是一个工业不发达和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这个历史背景是苏联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问题。

此外，苏维埃政权自其始建之初，就处于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中，对苏联的生存构成威胁的既有来自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对红色苏联政权的恐惧和多方打压，也有来自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黑色威胁。

斯大林认为，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为了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附庸，必须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即把苏联建设成一个不仅能生产一般消费品，而且能生产各种机器和设备的国家。斯大林坚持认为，经济落后必然要挨打。因此必须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他认为，苏联已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可以依靠行政力量来加快经济发展。因而，他主张用行命令、指令性计划的办法快速发展经济。

1925年召开的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宣布把俄国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由新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化工业强国。这次大会以“工业化的大会”载入史册。

从1925年起，就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

第一年五年计划的基本内容包括：5年内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投资为646亿卢布，其中对工业（包括电力）建设的基本投资从过去5年（1922-1927年）为195亿卢布，对运输业的基本投资从过去5年的27亿卢布增加到99亿卢布，对农业的基本投资从过去5年的150亿卢布增加232亿卢布。根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对工业部门的投资主要是用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于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为40亿卢布。

工业化的资金的基本来源为工业本身的积累；农业本身的积累；农业税；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所积累的资金；国家高价提供的农机具和工业品所取得的资金积累；压缩消费和扩大工农产品剪刀差所积累的资金；居民的税收和公债提供的资金。

在全体苏联人民的努力之下，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33年1月，以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了。

西方报刊对此表示惊叹：“五年计划的四年获得了真正卓越的成就，苏联像战时那样紧张地、创造性地建设新生活的基础，国家面貌焕然一新。”而西方此时正处于横扫欧美的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之中。

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又以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在此期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新切尔克斯克、车里雅宾斯克等地新建了众多的钢铁厂、机器制造厂，扩建了高尔基和莫斯科两大汽车制造厂。此后，苏联基本上停止了外国机器设备的进口，1937年进口机器的比重仅占苏联需求量的0.9%。

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努力，苏联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全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全苏的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变为1937年的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了。

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工业中的一个插曲，是一个具有极其明显的时代特征的特殊事件。

阿列克塞·斯达汉诺夫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很小给人放牛，只上过三年小学。他听说挖煤挣钱多，1927年来到顿巴斯的“中央伊尔敏诺”矿井挖煤，想攒钱买一匹马。“中央伊尔敏诺”煤矿是个破旧的煤矿，设备简陋，经常完不成定额，党委书记彼得罗夫多次受到指责，险些被戴上破坏分子的帽子。彼得罗夫想改变煤矿的落后状况，办法只有一个，干出一番震惊世界的大事。9月1日是国际青年日，他决定用打破采煤纪录的实际行动纪念这个日子。彼得罗夫选择创造奇迹的人，选中斯达汉诺夫，为什么呢？因为斯达汉诺夫在矿工中是一个从来干活不偷懒的小伙子。

由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这样写着：“1935年8月31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一百零二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十三倍。这一榜样促成了

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提高生产定额、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运动的诞生”。

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知道此事，立即上报斯大林，斯大林认为这是鼓舞人民斗志的一个典型例子，他立即责命苏共中央和各地地方机构发起学习斯达汉诺夫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要求人人争做“斯拉汉诺夫工作者”。“中央伊尔敏诺”煤矿从落后企业一下子变成先进企业。彼得罗夫更是名利双收，获得一套三居室住宅、疗养证和终身免费看电影的免票。

在苏共中央的号召下，全苏各地都纷纷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各行各业宣誓向斯达汉诺夫学习，掀起了在本行业创造新的生产纪录的浪潮，甚至连芭蕾舞演员也提出了单足脚尖旋转从五个增加到十五个的目标。

1935年11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斯大林在会上发表讲话：“……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没有某些工程师、技师和经济工作人员的那种保守主义和顽固思想；他们勇敢地前进，打破旧的技术定额，创造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他们对我国工业领导者制定的设计能力和经济计划提出修改，他们往往补充和修改工程师和技师的意见，他们时常教导工程师和技师，并推动工程师和技师前进，因为他们是完全掌握了本行技术并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

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斯达汉诺夫，斯达汉诺夫立即由一个普通工人变成了全苏劳动模范。1936年苏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批准斯达汉诺夫成为共产党员。身份发生巨变的斯达汉诺夫本人不再下井挖煤，而是忙于到全苏各地和各个行业做报告，他还被选为全苏最高苏维埃代表，他甚至获得了一套莫斯科著名的进滨河街公寓的住房。

斯达汉诺夫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全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加速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斯达汉诺夫运动本身具有极其明显的斯大林时代政治宣传和政治文化的特点。1936年5月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列·纪德访问苏联，纪德在《访苏归来》一书中谈到斯达汉诺夫运动，认为该运动是“用来对付懒汉的。他认为苏联生产率低下是懒汉太多的缘故。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最新发现的资料表明，斯达汉诺夫创造的采煤新纪录并未个人所为，而是他和两位工友鲍里先科和叶戈廖夫三人共同创造的，而矿党委书记彼得罗夫在上报成绩时则划去了两个人。矿工出身的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斯达汉诺夫受到了冷遇，因为他不相信斯达汉诺夫创造的采煤纪录。斯达汉诺夫不得以回到顿巴斯煤矿，重操旧业，并且沾上了酗酒的恶习。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曾给他颁发一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1977年，已不为人知的斯达汉诺夫在精神病院去世。

到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完成了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

波澜壮阔的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令世人和后人瞩目的巨大的成就，为卫国战争做好了充足的物质准备，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非常时期以非常手段加速建设的优越性。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深埋下在工业、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的巨大问题和巨大隐患。

第一，成就是以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农民的巨大的牺牲）换来的。暴风骤雨般的全盘农业集体化为苏联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的生活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以行政命令方式强调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作法根据上违背了列宁提出的改造农民的自愿和逐步的原则，在消灭富农阶级过程中更出现了大量的错划现象，使得占苏联居民人口最大比重的农民受到了心灵和肉体上的冲击，大量的农村居民因此饿死和病死。另有苏联学者估计，集体化时期受到各种冲击和迫害的农民达到500-1000万人。为片面发展工业化，苏联政府用超经济的行政手段将农民视为工业的“贡献者”，在集体化期间，通过行政命令管理体制，把农民束缚在农庄里，使农民失去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甚至连迁徙自由也受到限制。根据忽视农民的物质利益和切身利益，从农民身上拿走太多的资金。从

而影响到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使农业和牧业生产长期停滞落后，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工业化取得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重大的问题。首先是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农轻重经济发展严重失调，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其次是片面强调产值和产量，造成新产品单调，质量低劣。第三是盲目赶速度和扩大生产，经济粗放发展，生产效率低下，造成国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

二、异常激烈的党内政治斗争

列宁在去世前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持续十余年联共（布）党内路线斗争爆发了。

列宁在世的时候，政治局委员的组成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加里宁、布哈林和莫洛托夫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中列宁的地位是坚如磐石的，也是不容怀疑的，他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尽管病痛缠身，甚至远离克里姆林宫，但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和令人肃然起敬的。

我们从列宁的遗嘱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于1879年出生于俄国乌克兰赫尔松省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祖籍是犹太人，他原姓布隆施泰因。在1902年秋，他以托洛茨基的假护照逃到伦敦，后来就用了这个名字投身革命，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1902年，托洛茨基成为《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在1902年底加入了孟什维克，1904年又脱离了孟什维克，1905年担任了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17年7月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当选中央委员。在十月革命期间，托洛茨基担任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主席，具体领导了十月武装起义。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托洛茨基曾经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从托洛茨基的政治履历和担任的领导职务来看，可以说他在党内和党外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托洛茨基还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他不仅在军队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威信，而且在青年人当中也有相当一批崇拜者。

老布尔什维克斯蓬德在回忆录里面曾经写道，他说：“总的来说，托洛茨基在1917年发挥了自己的长处，他成为彼得格勒集会上最受欢迎的人。他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大家的好感，当时他简直成了1917年的丹东，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丹东。他在各方面表现出了他果断和胆量。但是他不具备那样的远见卓识，不像列宁那样善于把自己的个人的一切感情无限地服从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那么这些东西当时在实践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托洛茨基是最优秀的革命演说家之一，他具有惊人的演说才能，特别善于用通俗的语言来阐明很难表达的思想。托洛茨基他是最优秀的革命演说家之一。他具有惊人的演说才能，特别善于用通俗的语言来阐明很难表达的思想”。

列宁在《致代表大会信》中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完全与对斯大林的评价不同，列宁强调“尽管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的行政事物”，但同时又表示他可能是党内最有领导能力的人，同时列宁并没有说将托洛茨基调离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187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的哥里省的一个鞋匠的家庭。他从1894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9年因为参与推翻政府的宣传，被神学中学开除，在1903年，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从那时起，他一直是一个积极的共产党员。从1902年4月到1913年的3月，他因为革命活动数次被捕、被流放、被监禁。斯大林原来的姓、名和父称是叫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也就是说他姓“朱加什维利”，但是他在革命活动中，他使用了“钢”（Сталин）这个姓，后来也就变成了他的姓名。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从流放地返回彼得格勒，领导《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并参加了全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列宁的领导之下，他也积极参与和组织了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

在十月革命后，斯大林被选入列宁为首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被任命为民族人民委员，这表明列宁对斯大林少数民族身份的关注和信任。在斯大林政治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就是，在1922年的4月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提议，斯大林当选为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总书记。此后 30 年里直至去世，他一直担任党的这一最高领导职务。

加米涅夫于 1883 年 7 月 22 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工程师家庭。1902 年秋，他在巴黎参加了《火星报》的编辑部的工作，后来在 1903 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成为布尔什维克。他在 1917 年 4 月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委员。但是，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的 1917 年的 10 月 18 日，与季诺维也夫联合在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表示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的决定，受到列宁和中央的严厉批评，列宁在《致代表大会信》中还提到这一事件，认为这不是“偶然的”。1918 年 7 月，加米涅夫被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莫斯科人民委员会主席，1922 年加米涅夫被选为苏俄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还担任了苏俄人民委员会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在列宁生病期间，加米涅夫不仅主持了人民会议，而且还主持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因此，列宁是称赞加米涅夫是一匹拉了两辆车的“骏马”。

说到加米涅夫，就不能不提季诺维也夫了。他于 1883 年出生于乌克兰赫尔松省叶利萨维特格勒。季诺维也夫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就投身于革命活动，在 1903 年 7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 年革命后他回国，在彼得堡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参与策动喀琅施塔的水兵起义。1917 年 4 月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作，并担任《真理报》副主编。1917 年 12 月，他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9 年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他几乎是列宁唯一的支持者。

在列宁去世前，实际上在俄共（布）党内，就形成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三人的联合，他们的对手是托洛茨基。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其实在列宁生前已经十分紧张了，并因此引起病榻上的列宁的极度担心。

在列宁去世之后，在联共（布）党内发生了三次大的政治斗争。

第一次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与托洛茨基派的斗争。

1923 年 10 月 8 日，托洛茨基给俄共（布）中央写信，指责党的机关过分的“官僚化”，“脱离群众”。他强调说：“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基本上就已经形成的，在代表大会之后完形成和固定下来的那个制度，比起军事共产主义最严酷时期的制度来说，距离工人民主制度要远得多”。

10 月 15 日，托洛茨基又召集党内反对派，即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在他家里集会，讨论并通过了致中央政治局的《46 人的声明》。“声明”强调：“目前形势极端严重，……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会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机”。托洛茨基认为党内现成的制度是不能容忍的，它扼杀了党的独立自主性，是以这种官僚所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他认为：“党内现成的制度是不能容忍的，它扼杀了党的独立自主性，是以这种官僚所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托洛茨基发难的实质上就是要求撤换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那就是总书记斯大林。同时托洛茨基还把矛头指向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故意重揭两人反对十月武装起义之事，称他们在《新生活报》上廉价出卖党的机密，并且引用列宁的话称他们是“工贼”。

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列宁的《致代表大会的信》这种剑拔弩张的场合下显得极为重要，我们知道，列宁对几位主要领导人都做出了评价，而且对像斯大林的评价是致命的。1923 年 4 月，俄共（布）十二大召开，大会并没有讨论斯大林从总书记职务调动的问题，原因就是《致代表大会的信》的后半部分没有在大会上公布，因为列宁还在世。1924 年 1 月列宁去世之后，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才启封并看到了这封信的全部。在 1924 年 5 月 23 日的俄共（布）十三大召开前，克鲁普斯卡娅按照列宁的嘱托，将《致代表大会的信》提交给大会，并且强调要予以宣读。斯大林知道此事之后，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大发雷霆，责怪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克鲁普斯卡娅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没有错的。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过强烈的愿望——把这些记录在他逝世后交给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此次大会上，加米涅夫宣读了《致代表大会的信》的部分内容。季诺维也夫在宣读后首先发言：“同志们，你们都知道，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我们不止一次地宣誓要实现伊里奇的遗志。你们也很了解，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一诺言。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告诉大家，伊里奇的这一担心并没有应验。你们大家都是近几个月来，我们共同事业的见证者。你们和我一样，满意地看到了伊里奇的这一担心并没有出现，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

季诺维也夫建议，选举斯大林继续担任俄共（布）中央总书记，加米涅夫建议当场举手表决，结果多数人同意斯大林留任，只有托洛茨基等少数人反对。这次代表大会谴责托洛茨基是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同时又强调，发生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这场辩论对于党内民主具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

俄共（布）十三大上还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有权以三分之二票数把任何一个违反党纪和从事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从正式中央委员降至为中央候补委员，直至开除党籍。这一条款在日后的党内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3年到1924年这场党内斗争的结果是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更加巩固，这也意味着他本人也代表党的正确路线。

第二次党内政治是斯大林反对“联合反对派”。

在1925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十四大上做出了一项决定，就是鉴于1922年苏联成立，将共产党名称由俄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也就是联共（布）。

斯大林与原来政治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新反对派”的矛盾公开化了，新反对派在十四大决议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二人虽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是季诺维也夫被解除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加米涅夫也被解除了劳动与国防会议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1926年4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进行了秘密会谈，托洛茨基被推举为“联合反对派”的领袖。在1926年7月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当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捷尔任斯基竭力地为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辩护，他大声斥责反对派，但最终由于争吵而疲劳过度，乃至虚脱，几个小时后去世。

由于这次大辩论牵扯的人和事都非常大，因此联共（布）中央决定在全党实行公开辩论，在《真理报》上出版争论专号。辩论结果，99%的党员拥护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拥护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联合反对派路线的党员则不到1%。

最终中央全会不仅严厉谴责了联合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并且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同年10月17日，联合反对派被迫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承认自己的行为是“违反党纪的、越出了党所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走上了闹宗派的道路”。并且宣布“立即解散所有的为了维护反对派观点而成立起来的那些宗派的集团和组织”。

随后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上通过决议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联合反对派成员开除出党。1928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宣布与托洛茨基脱离关系，被恢复了党籍。托洛茨基被取消苏联国籍，于1928年被苏联国家保卫总局押送出境，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亚坎住地被苏联特工人员杰克逊用冰镐刺杀。

第三次党内斗争发生了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1928年以后，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在如何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及其他经济领域发展方针等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布哈林于1888年9月27日出生于莫斯科，他天资聪慧，4岁半就能读会写，1906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12年秋，他第一次与列宁见面，列宁非常欣赏他的理论水平和飞扬的文采，推荐他为《真理报》撰稿。到1917年，29岁的布哈林就已经是俄共（布）中央委员，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

在 1928 到 1929 年农业集体化如火如荼般地在苏联大地上展开之时，不断有“整村、整乡、整区，乃至整个专区”实现集体化的这种特大的喜讯报告上来，然而身为《真理报》主编的布哈林手中却有“整乡、整村”人饿死的群众来信。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建议改革在农村推行集体化的过火的做法。

1929 年 9 月 30 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表达了在发展苏联经济问题上自己与斯大林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斯大林发展工业化的主张“过分集中化”。

布哈林在 1929 年 1 月 29 日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大会上，做了关于列宁政治遗嘱的报告，试图唤起人们对列宁遗嘱的重视，不点名地批评了斯大林的路线，强调要继续列宁“最后的、最周密的指示”。

1929 年 4 月斯大林主持了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宣布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集团，称他们是“工联主义的政客”。会议最后的决定是解除布哈林的《真理报》主编和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主席的职务。在 1929 年 11 月中央全会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被迫宣读“三人声明”：承认党的成就是无可非议的，承认党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强调“我们”和中央多数派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全会最终还是宣布把布哈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并给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以警告处分。

如何看待联共（布）党内早期三次重大政治斗争？

三、肃反，还是政治大清洗？

中国人最早知道苏联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主要是借助于那本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这部由斯大林亲自审查，由联共（布）中央专门审定，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把“肃清反革命运动”作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成果而大书特书的。

当思想解放的春风刮遍中国大地之后，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称那场运动是“肃反”，或者说“肃反扩大化”，都是极不合适的，更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著名的苏联史专家陈启能先生表示：“我们过去恐怕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总是把‘大清洗’说成是‘肃反扩大化’，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来套苏联的历史，我们总是习惯说苏联 30 年代是‘肃反运动’，直到最近发表的文章仍然如此，其实苏联人自己并不这样说，他们习惯用的是镇压、清洗、恐怖和迫害。肃反运动（又称“大清洗”运动）‘肃反运动’顾名思义，首先是肯定有反革命存在，首先去肃清，那么这个大方向没有错，在这个前提下，即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制造了多少的‘冤假错案’，不管范围有多大，似乎也只是正确的大方向下出现了些许的偏差乃至严重的偏差。而苏联情况并不是这样。”

为什么中国历史学家发出这样强烈声音呢？一方面迎来了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春天。另一方面随着大量的原始俄文档案的公布，中国学者可以看清那段历史的真实面目了。

大清洗作为一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和涉及极其之广的、持续时间非常之长的政治运动起源于 1928 年，在 1934 年 12 月达到高潮，随后的 1938 年 3 月至 1953 年是大清洗的延续阶段。

1928 年初，苏联国家安全保卫局破获了震惊世界的“沙赫特案件”。沙赫特是顿巴斯的一个矿区，苏联保安机关指控矿区中有大批专家蓄意破坏苏联最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有 50 多名专家被逮捕，其中 11 人被判处死刑。“沙赫特案件”被侦破后，斯大林据此得出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结论，他在 1929 年 4 月的中央全会上宣布：“现在我们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经落网，但是还远没有捕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这种暗害活动所以危险，尤其是因为它和国际资本有联系。资产阶级的暗害活动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分子还远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来进行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①在斯大林的号召下，全国上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抓沙赫特分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5 页。

子”运动。

大清洗从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害之后达到了高潮。

基洛夫是苏联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他在担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期间，工作出色，使列宁格勒成为全苏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也使列宁格勒居民的生活水平高于全苏的平均水平。基洛夫与斯大林的私人关系也非常好，他在列宁格勒工作得到了斯大林的充分支持。1934年12月1日16时，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办公地斯莫尔尼宫的走廊上，被刺客尼古拉耶夫开枪打成重伤，最后不治身亡。事发之后，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对凶手予以制裁并查明真相。当晚，斯大林和其他的党的领导人都赶到列宁格勒，亲自处理这一严重的谋杀案件。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未经政治局讨论，就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一项决定，即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做了修改，命令苏联刑事侦查部门从重、从快对策划和恐怖活动的案件进行审判，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并且不得赦免。这一条超越苏联法律的规定就成了大清洗日益严重的一个很重要法律依据。

由基洛夫遇害引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清洗运动。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各级党组织和执法机构发出密信，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铲除机会主义的好心肠，它的根源就是错误地认为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会越来越驯服、善良……布尔什维克决不应高枕而卧，决不应马虎从事。我们不要好心肠，而要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

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大清洗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其标志是1936年7月29日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向各地党组织发出的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间谍恐怖活动的密信，信中说：“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谍、内奸、破坏分子、白卫分子、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应当了解，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要善于识别党的敌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①这封密信传达到各级党组织后，大清洗运动也随之进入高潮阶段。

大清洗首先是对斯大林的原反对派的大规模的逮捕、审判和镇压，在1936年至1938年间发生了举世关注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

第一次大审判发生于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原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等人立案审判，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审判长瓦西里·乌尔里赫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人接受托洛茨基的指令，组织“联合总部”，并策划和实施了基洛夫的暗杀。主要被告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被处以死刑。

第二次大审判发生于1937年1月23日至30日，案名为“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被告是原“联合反对派”成员皮达科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阿尔诺里特等人，他们在20年代党内斗争时曾支持托洛茨基。苏联最高检查长维辛斯基指控他们“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译工作，实行恐怖和暗杀勾当”。法庭最后宣判皮达可夫等13人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阿尔诺里特被处以10年监禁。

第三次大审判发生于1938年3月2日至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21人起诉，案名为“右派和托洛茨基反苏联盟”，罪名除了“谋害基洛夫”“策划谋害斯大林”外，还有“谋害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1918年谋害列宁”“企图使乌克兰、白俄罗斯、远东、外高加索、中亚脱离苏联版图并把这些地方都出卖给帝国主义”等等。法庭最后宣判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罗林霍尔德、伊万诺夫、切尔诺夫、格林科、泽连斯基、伊克拉莫夫、霍扎耶夫、沙兰戈维奇、祖巴列夫、布拉诺夫、列文、卡扎科夫、马克西

^① 《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4页。

莫夫—季科夫斯基、克留奇科夫等 19 人死刑，并将他们的财产充公，其余的人也被处以 10 年以上徒刑。

在第三次大审判里，布哈林是主要的罪犯。为了保全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布哈林不得不被迫承认自己和“托洛茨基分子组织”有过联系。1936 年 3 月 14 日凌晨 4 点，法庭宣布布哈林等 19 人被处以极刑，予以枪决。获准旁听法庭审判的英国外交官马克林准将深有感触地在日记中写道：“布哈林是一个不从事间谍的间谍，是一个没有背叛行为的叛徒，是一个没有谋杀行为的凶手，是一个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份子”。

布哈林在被捕之前，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来日不多，写下了一封长篇的《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作为自己的政治遗嘱。

布哈林在信中宣布：“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刀斧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的刀斧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它有组织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语。他们的行动是非常果断而有信心的。现在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这颗毫无罪恶的头，将会株连几千名无辜的人，因为要制造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的几天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早晚不可避免的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1988 年 2 月 4 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的决定。布哈林年迈的妻子拉林娜被邀请到苏共中央委员会。她对记者发表了谈话：“我 50 年经历的深刻内心感受，若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太显贫乏。况且叙述往事，这就意味着要重新生活一遍。唯一能够说服我的，鼓励我去回首往事的，是我对历史所负的责任，是我对死去的丈夫所负的责任，因为除了我，再没有任何人能像我一样提供这样的证词”。

中国著名苏联史专家、《布哈林评传》的作者郑异凡先生评价：“布哈林案件并不是一件孤立的案件。这是从 20 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案件发展的顶点，那么在此之后，镇压没有停止，但像布哈林这样著名的人物已经没有了。这就像一张展开而后又不断收紧的网，打上来的最后一条大鱼就是布哈林”。

政治大清洗是大规模的，在党内几乎涉及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党员，在军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少数民族以及苏联国际友人中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在领导十月革命的 2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被敌人杀害的有 3 人（查帕里泽、乌里茨基、邵武勉），自然死亡的是 5 人（列宁、捷尔任斯基、诺根、斯维尔德洛夫、谢尔盖—阿尔乔姆），因政治原因自杀的是 2 人（约费、斯科里普尼克），失宠被贬的 3 人（穆拉诺夫、斯塔索娃、柯伦泰），被镇压的是 15 人（别尔津、布哈林、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基谢廖夫、克列斯廷斯基、洛莫夫、米柳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李可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雅科夫列娃）。

首届苏维埃政府的 16 名成员中，除列宁、诺根、卢那察尔斯基、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 4 人在大清洗前死亡外，有 12 人在大清洗中被枪毙或暗杀（阿维洛夫、迪宾柯、加米涅夫、柯鲍泽夫、克雷连柯、洛莫夫、米柳亭、奥甫谢因柯、李可夫、泰奥多罗维奇、托洛茨基、施略普尼柯夫）。

从 30 年代至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对军队的清洗更是惊人。据统计：5 个元帅中 3 人被处死，5 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 3 人被处死，12 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处死，67 个军长中 60 人被处死，199 个师长中 136 人被处死，397 个旅长中有 221 人被处死，456 个上校中 401 个被处死。16 个一级和二级集团政治委员全部被处死，15 个二级军政治委员全部被处死，28 个军政委中 25 个被处死，97 个师政治委员中 79 个被处死，36 名旅政委中 35 人被处死。军队的损失是惨重的。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初期苏联连连失利，这里除了德国法西斯采用了“闪击战”和斯大林对西线情况判断有误的原因外，其中也包含着苏联军中几无“大将”的原因，一些刚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甚至尚未毕业，尚无作战经验的军官无法胜任仓促之中授予他们的军衔和职务。

此外，大清洗还牵涉一些国际友人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士。意大利共产党员埃德蒙多·佩鲁扎、帕·罗波蒂、比利时共产党员赫伊洛、维尔捷年、西班牙共产党员斯捷尔尼—科列别尼等因各种罪名被处死。

大清洗何以在 30 年代中期达到高潮？

原因之一在于经济上“大转变”的严重的负面政治结果使斯大林得出结论：取得的胜利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

全盘农业集体化是以极大地牺牲农民的物质利益并使农民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完成的。在农业化过程中，对农民采取了暴力和强制方式，对拒绝交粮者采取各种的体罚和刑罚，甚至大规模的逮捕、流放和处以死刑，使得在农村引起了激烈的对抗。据当代俄罗斯著名的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专家据达尼洛夫收集的资料显示，1929 年全苏有记载的农民骚动达到 1300 次以上达尼洛夫的资料，仅 1930 年的 1 月到 3 月这 3 个月里边，有记录的农民的骚动达到了 2700 次以上，卷入的农民达到了 130 多万人。

《真理报》不断收到了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当年的雍是正确的，而且在党内出现了较明显的改革呼声。代表人物是卓越的苏联红军高级指挥员、苏联军队机关报《红星报》主编柳亭，柳亭联合 18 个人草拟了长达 200 多页的意见书，即《18 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提出放慢工业化的步伐，结束农业集体化，恢复党内民主的主张。这封信在党内秘密流传，影响甚广。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柳亭等人。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枪毙柳亭，这是斯大林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点名提出对一个普通党员处以极刑的要求，但是斯大林的建议当时被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拒绝了。1932 年 10 月，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通过决议，把柳亭等 18 人开除出党并处以流放。

原因之二在于苏联外部环境日益恶化、战争威胁临近以及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1936 年国际政治舞台上风起云涌，出现了战争的乌云。英法在西班牙事件、波兰问题、苏台德问题上寻求同德国、意大利妥协，大打“绥靖政策”之牌，企图将法西斯黑色祸水东引苏联。

斯大林担心在苏联国内和党内，存在着大量的为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服务的特工人员，即所谓的“第五纵队”，并且已经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大清洗是在苏联非常时期，苏联党内和国内政治生活不民主、个人专权独断、权力监督机制完全失效、少数党内的坏分子借机弄权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必须要正本清源，还大清洗以本来面目，并且了努力避免类似的历史大悲剧。

四、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斯大林在 20 年代中期至 40 年代初有关政治体制和党的建设的思想总的特点是强调权力集中和思想集中。他这一时期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他所虚拟的“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化”的基础之上的，他在理论上论证了实行高度集权的必要性。他认为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则愈激烈，“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的残余敌人也会愈加凶恶，阶级斗争就会愈尖锐。”而苏共党内必然有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党内“脱离列宁路线的倾向”的即是“垂死阶级反抗的反映”，因此要采用“连根拔除和粉碎的办法。”斯大林将民主集中制思想推向极端，他强调不应该把党内民主问题偶像化，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为了打击各方面敌人的进攻，就必须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强化党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以至社会生活的控制，斯大林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

从 20 年代中期到 40 年代初，苏联高度集中政治体制——斯大林政治模式最终形成。

其主要标志是：

第一，限制以至取消党内民主。从 20 年代中期开始，斯大林以党内“无情斗争”和全社会“肃反大清洗”的方式不断剪除异己和政治上的反对派，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绝对地位。

第二，强化苏共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绝对控制。以苏共中央取代中央政府职能，

在苏共内增设经济、财政和文化管理机构，使权力进一步向苏共集中，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高于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形式（工会、合作社、国家组织），它的使命是综合和指导这些组织的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的党才能实现”。

在这种理念下，中央监察委员会职能被削弱，群众监督机构——工农检察院被撤消。在苏联的第二部宪法（1936年宪法）中强化了中央集权制，使行政区划权、立法权和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联盟政府、向苏共中央集中。

第三，总书记个人专权政治模式的建立。扩大总书记的职权范围，在国家权力进一步向苏共集中的同时，权力向苏共的最高领袖个人手中集中，使总书记变成全党的最高领袖和國家的首脑，总书记独揽党政军大权，不受任何组织和法律的限制而可以随意决定重大国务，将书记处变成直接向总书记负责的党内特权机构。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

斯大林执政初期，苏联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直到1926年，苏联领导人仍然把反集中倾向作为经济政策的重点。当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苏联工业》的报告中曾批评了“现行管理制度的特点是事情不分大小都要过问和过分要求集中”，提出要“尽量把权限和责任划交下级环节。”

1926年12月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的思想。1927年12月，斯大林又提出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思想。

从1928年开始，随着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快速推进，新经济政策完全停止。在1929至1932年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改组。改组的目标就是由地方和行业自主经营向中央集权制过渡，加大中央政府和各级行政机构自上而下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

30年代以前苏联的经济领导层次较复杂，最高管理机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各部门的总管理局，以下是各行业的托拉斯和辛迪加。尽管采取是集中统一管理，但托拉斯和辛迪加拥有相对的自主权。根据1929年的改组决议，撤销了总管理局和辛迪加，成立实行经济核算的各个联合公司，统一管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再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联合公司，由原来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局→托拉斯（企业）→辛迪加（企业）的四级管理模式变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联合公司（后改为总管理局）→托拉斯（企业）的三级管理模式。后来总管理局又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分出，成立专业化的中央经济管理部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和计划的制定。1934年联共（布）中央决议又撤销托拉斯一级，规定企业直属中央部门管理，这样又形成了中央专业管理部门→企业的二级管理模式，原来属于地方管理的一大批的企业收归中央专业管理部门。例如，从1933年初至1935年初，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会部所直接管理的企业就由32个扩大到335个。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央管理的工业占90%，地方管理的工业仅占10%。大部分企业（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企业）实行二级企业（即中央→企业），一部分企业（冶金、燃料工业企业）实行三级管理（即中央→托拉斯→企业）。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直接控制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供应、生产和销售的大权。企业的厂长由中央委派，企业的财政收支要经中央批准，企业的物资供应要由中央统一调拨。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是采取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斯大林曾经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想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都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①

中央部门事无巨细地规定企业的年度计划、季度计划甚至月度计划。对于中央的计划，企业必须执行，企业如果破坏计划任务，政府可追究行政责任直至法律责任。与指令性计划的特点相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0页。

联系和相适应，行政命令手段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管理经济的直接要求和主要方法。政府主要通过发布各种命令、决议和行政措施，与各级各类经济组织、企业发生关系，组织全国的生活，而忽视或放弃价格、利润、奖金、财政等纯经济的手段来管理国家经济。

五、斯大林的个人专权与个人崇拜

1929年12月21日的《真理报》用整版的篇幅为斯大林庆祝50大寿，标题是“向约·维·斯大林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忠诚接班人，为马克思列宁的纯洁性，为联共（布）的共产国际队伍钢铁般的统一和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的领袖，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世界六分之一国土上建设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领袖，《真理报》的老领导，致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斯大林欣然接受了《真理报》的祝寿辞，并且写了感谢信发表在第二天的《真理报》的第一版上：“我把你们的祝贺看作是对按照自己形象诞生的我和培育我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正因为我把这种祝贺看作是对我们光荣的列宁党的祝贺，我才敢于向你们表示布尔什维克的谢意”。

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歌颂斯大林是“我们所有一切巨大胜利的伟大执行者，党的全部基本工作都是按照是斯大林同志的指示，由斯大林同志发动和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

1929年出版的《斯大林传》试图告诉读者：“列宁在世时，作为他的学生之一的斯大林是他的唯一的最可靠的助手，他区别于别人的是，当党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下所经历的全部重要革命阶段，一切大转折的关头时，斯大林始终丝毫不动摇地和列宁肩并肩地前进。”

联共（布）15大被开除党籍的原中央委员拉狄克在《真理报》上发表长篇文章，颂扬斯大林是“列宁最好的学生，是从列宁党脱胎出来的，党的骨就是他的骨，党的肉就是他的肉”。

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于1935年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莫斯科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斯大林对我是一个谜，暂时我还不能解开这个谜：他在所有的行为和言论中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纯朴和严肃的人，讨厌赞扬。他怎么会允许在苏联出现围绕他的那种气氛，不停地对他大加颂扬？……他的头脑在想什么？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

卫国战争胜利后，作为同盟国“三巨头”之一的斯大林的威信在战后达到了顶峰，也为他的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的加剧创造了条件。党内、新闻出版界、文化艺术界对斯大林的颂扬越来越无止境。几乎每天的苏联的主要报刊上都要在显著位置刊登斯大林的大幅照片。“亲爱的领袖和导师”、“敬爱的慈父”、“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伟大的领袖”、“我们地球上最伟大的人物”等颂扬之词逐步升级，已达到无已复加的地步。甚至在最高苏维埃批准的新国歌中也加入了“斯大林培育我们，让我们忠于人民，热爱劳动，鼓励我们去建立功勋”，但却一字未提列宁的名字。他的半身胸像被矗立在高加索的最高峰爱尔勃鲁兹峰上，塑像的底座上镌刻着：“献给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斯大林一人完全代表了党、政府、军队和立法机构，在他执政期间也就不需要召开党和政府的大会了。列宁时代在6年内召开了6次全国性的党的代表大会，一次代表会议和79次党中央全会。列宁逝世后的前7年召开了4次代表大会，5次代表大会会议和13次中央全会。但是后来的20年中，即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盛行时期（1934-1953年）总共只举行了3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一次代表会议，而第18次代表大会与第19次代表大会相隔了13年之久。在这20年里只召开了23次中央全会，这些全会多数是战前召开的。1941、1942、1944、1945、1946、1948、1950、1951年连一次中央全会都没有召开过。

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和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别墅斯大林的私人

宴会上决定的。

后来的苏共领导人、宴会的常客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记载：宴会通常从晚上 10 点钟开始，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4、5 点钟。在这种宴会上，与会者从每日新闻、凡人琐事、生活趣闻到严肃的政治问题、外交问题无话不谈，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也在这里决定下来。

1948 年内务部长贝利亚向斯大林诬告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人建议把俄罗斯联邦中央迁到列宁格勒，目的在于另立中央，反对党中央的领导。随即，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奥诺夫等人被捕，1950 年 9-10 月，上述人员因“叛国罪”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这个案件被称为“列宁格勒案”。

1953 年 1 月 13 日，《真理报》公布一起惊人的消息：苏联内务部破获了克里姆林宫内的一个阴谋团体，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放射科医生雷吉娅·季马舒克密报，宣称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许多有名医生“妄图通过有害的治疗来缩短苏联积极活动家的生命”。国家安全部们侦查的结果“表明”，这些医生（许多是犹太人）与外国的特务机构——国际犹太人恐怖组织“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有联系，直接接受该组织的指挥，专门从事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为美帝国主义服务，随后在苏联掀起一股反犹的波澜。

1953 年 3 月 5 日晚，孔策沃别墅的警卫人员发现斯大林没有按惯例用电铃通知送晚饭，这使斯大林的警卫人员非常着急，但是他们不敢打开斯大林房间的那扇大门。几个小时后，实在沉不住气的警卫人员终于打开了铁皮紧封着的大门，看到斯大林已经中风倒在地上。当晚 9 时 50 分，斯大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 74 岁。第二天，莫斯科广播电台以各种语言向全世界宣布斯大林去世的消息。

六、本章小结

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毫无疑问，这是极其困难的学术问题和更加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需先解决一个问题：斯大林与第二代领袖现象。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存在着一个较为普遍政治现象，一般称之为第二代领袖现象。

第一代领袖多为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在长期斗争中树立了极高的个人威望，深受他所领导的党派以及公民的爱戴。在新的政权建立后，第一代领袖为新国家在政治、经济建设等方面确定了方针大政，第一代领袖一般也都是以自然死亡，而非被选举下来或被推翻的方式终结其最高统治权力的。第一代领袖的形象一般最后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在他的身上体现着权力和威望。

毫无疑问，第二代领袖是相对第一代领袖而言的。第二代领袖是第一代领袖的接班人，一般说来他往往也是第一代领袖集体的成员之一。他是第一代领导人的战友、朋友，他的身份和统治可以比较快地为党内和公众所认可。第二代领袖是第一代领袖事业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其事业的发展者。第一代领袖的主要任务是在形式上打碎旧的政权体系，第二领袖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内容上建立新的政权体系。

第一、在政权建设方面，第一代领袖是在推翻旧政权后建立新政权的，政权初立，时间不长（一般都是 5-10 年）。镇压旧政权残余分子、稳定新政权是第一代领袖的任务。然而彻底消除旧政权势力和反对派，完善政权内部结构，扩大政权控制区域，使国家局势由无序过渡到有序阶段，由不稳定形态过渡到稳定形态，是第二代领袖的历史使命。

第二、在思想发展方面，第一代领袖的思想虽英明远见，但也有相当成份具有实用性、暂时性和谬误性，需要第二代领袖在实践中甄别和发展。第二代领袖对第一代领袖遗留下来的思想遗产要实施继承——扬弃——发展，因此第二代领袖的思想必然给国家的发展造成空前影响和深刻变化。

第三、在领导方式上，出现第一代领袖集团集体决策向个人最高决策、以至个人专权、独裁过渡的周期性复归现象。

第四、围绕指定的“接班人”的问题，在权力更迭之际出现巨大权力的真空时期，总有绝对

权威陡然弱化的过渡型领袖人物出现。

第五、第二代领袖囿于第一代领袖统治方式和思想的无形桎梏，在价值取向上处于继承还是肯定，因循还是发展，止步还是前进的两难境地。

斯大林是列宁的亲密同志和战友，是典型的第二代领袖。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斯大林作为苏共的第二代领袖，身处于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以及党内路线斗争的环境之中，他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是异常巨大的。他作为苏联和苏共领导人，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领袖，深刻而透彻地分析了苏联面临的国内任务和国际环境，将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以壮大综合国力，以备迎接难以避免的西方势力威胁和德国法西斯势力入侵。斯大林不仅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完成了保家卫国使命，而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世界和平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斯大林不仅领导苏联人民在极短时间创造了工业化和农业化的世界奇迹，极大地加强苏联的综合国力，而且使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信仰走出国界，发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核心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等方面犯有严重的错误，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表现出与无产阶级领袖完全不相符的品质。由于认识的偏差，斯大林最终放弃了列宁刻意主张的新经济政策道路，而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险途。仅适用于战争环境和非常时期的斯大林模式，不仅对苏联历史发展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都产生极其消极的重大影响。在处理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关系上，斯大林与苏共在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同时，也表现了极其明显和有害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

因此，我们在评价斯大林功过时习惯采用的“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都没有实际意义。关键在于，我们要把斯大林看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功劳卓越的苏联领导人，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共产党领袖。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斯大林政治传记》作者艾萨克·多依彻早在1948年，即斯大林还健在时评述的，“绝对不能把斯大林归入希特勒一类的人物中；在所有的暴君中，希特勒的记录是最不足称道和最无价值的。希特勒是一个毫无建树的反革命领袖，而斯大林却是一场悲剧性的、自我矛盾、但又是创造性革命领袖和开拓者”。

从某种角度看，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他个人的错误，斯大林的悲剧也绝对不是他个人的悲剧。

谈到斯大林模式评价问题？我们首先应区别一些常用而混乱的学术概念。

“斯大林模式”与“苏联模式”、“斯大林体制”的概念在我国的苏联史著作极为常见并且没有得到明显界分。“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实际运行的国家管理模式，既包括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考和行政决策，也包括了苏联国家体制、政策执行、党务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经验教训的统称。“斯大林体制”则仅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运行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体制的称谓，不包含理论指导和行政决策层面的内容，也不包含国家体制、政策执行、党务政治和社会生活运行方面的效果。显然，二者是从属关系，即“斯大林模式”大于“斯大林体制”，或许说“斯大林体制”则包含于“斯大林模式”概念之中。“苏联模式”是在内涵和外延上均大于“斯大林模式”的概念，因为“斯大林模式”仅指1924-1953年斯大林执政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考和体制建设以及政策执行效果，而苏联模式显然是包括了整个苏联存在的70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考、体制建设和政策执行效果。它不仅包括斯大林模式，也应该包括列宁、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的思考和实践。比较而言，“斯大林模式”是较为科学的概念，同时也是本讲使用的目的所在。

关于斯大林模式产生的原因，仅为常见的是归结为三大原因。第一是历史文化因素所致，即俄国是一个有着三百多年绝对专制制度统治历史的国家，以集权主义和权力本位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传统对于苏维埃领袖和苏维埃群众的政治取向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第二是现实因素所致，即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处于极其险恶的环境之下，此种条件影响了苏维埃领袖选择党政合一、以党代政、意志绝对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第三是斯大林个人因素所致，即斯大林因其民族、教育等因素限制，使其文化水平和民主意识均无法与列宁等人

相较，反而俄罗斯文化传统的惰性因素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

此外，本人认为在谈到斯大林模式产生的原因时，有两个重要原因不能忽视。

其一与俄国历史的赶超式发展传统有着密切关系。18 世纪前的俄国曾为欧洲的穷乡僻壤，也曾是它四邻强国屡屡进犯的对象，彼得一世后的俄国尽管已渐渐步入欧洲国家之列，但始终在经济、军事和社会发展上落后于西欧。因此，从彼得一世开始，俄国统治者就采取了赶超式的发展模式，列宁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实际上是这一传统的隐现，而斯大林曾直接地继承了这一历史传统，斯大林模式实际上就是赶超模式。

其二与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先行和思想动员居先有关。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主义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意识形态先行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与民粹派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旨在夺取政权然后依靠政权的力量改造社会，革命者将自己头脑中的新社会蓝图变为现实。这种意识形态先行的特点赋予了高度集中、政治权威和统一意志以天然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实践，意识形态先行、高度集中、政治权威和统一意志便成就了斯大林模式。

如何评价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

西方学者有两种不同看法。传统学派认为，斯大林模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主要从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方面分析其产生原因，并认为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修正学派则认为斯大林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而是历史的选择。因为当时在苏联存在三种模式可供选择，即斯大林模式、布哈林模式和托洛茨基模式，但各种因素的作用最终选择了斯大林模式。

苏联和俄罗斯史学界有两种不同观点。少数学者认为，斯大林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他们的论据是，社会主义有非常管理和正常管理两种形式。非常管理形式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非常管理时期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必经时期，不管有无斯大林，非常管理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它是苏联历史发展的必然。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不能只看斯大林模式取得的成就，更主要是看这些成就是采取什么手段获得的。苏联人民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非常管理形式决非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 20 年代末的苏联，也并非仅存斯大林模式一种选择，还有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模式的选择。

在我看来，斯大林模式是历史上第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产生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存在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现形式。它的实行创造了非凡的成就，而它自身却具有许多内在的弊端。它曾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模式，但也罹患于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

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以行政命令手段迅速地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集中于某一部门或某一重大项目。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顺利并提前完成，苏联的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顺利完成，以及卫国战争前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军事和军备的全国总动员都足以证明这一模式的高效率。但是它在经济上生产资料由国家集中控制，经济生活服从集中制定的经济计划，根本忽视商品价值规律，严重超越苏联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使中央与地方、企业与个人的关系长期处于极度不正常的状态。

在政治、文化和思想领域，斯大林模式实行党和国家的集中领导，党政合一，以党代政，高度集中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集中在一定的时期又极度地强化为权力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甚至向个人手中集中。因而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因最高领导人决策失误，而导致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导致党内政治斗争频繁甚至大清洗等。

[建议阅读文献]

[英]艾萨克·多依彻著，于干译：《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俄]卡尔波夫著，何宏江等译：《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刘克明,吴仁彰主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东方出版社 1992 年版

王正泉主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政治体制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Геллер М. Я., Некрич А. М. *Утопия у власти*. Москва: МИК, 2000.

Mikhail Heller and Aleksandr Nekrich, *Utopia in power :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 Summit Books, 1986.